

「同病相憐」與「他山之石」 ——冷戰時期台灣與韓國文壇的 相互認識

崔末順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中文摘要

1948年韓國與中華民國建交，冷戰期間兩國以兄弟之邦自許，共同對抗中共與北韓，官方與民間交流頻繁。文壇亦在此背景下展開互動，透過國際筆會、作家協會等組織促進作家互訪與文學交流。本文聚焦1957年與1976年兩次作家訪問團：前者為韓國文人來台，出版《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描繪台灣社會發展與自由中國形象；後者為台灣詩人赴韓，出版《雪花的約會》，抒寫對韓國文化與歷史的感受。對比這兩次訪問團的紀錄可見，五〇年代韓國文人對台灣的印象主要聚焦於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具有明顯的未來導向；而七〇年代台灣詩人團對韓國的印象則更多反映對自身文化認同的確認，呈現出過去導向的視角。此對比顯示冷戰初期與後期時代變遷對台韓交流的影響，亦體現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變化，尤其受中國現代史發展的牽動，可以說呈現了反共意識在不同時期的雙重面貌：一方面，強調建立優於共產勢力的現代國家，以發展與進步為目標；

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對共產勢力破壞民族文化與傳統的懷舊情懷。雖然這兩種立場方向不同，卻同樣植根於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型態之中。

關鍵詞：冷戰時期、台韓文壇、反共意識型態、《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
《雪花的約會》

Shared Struggles and Lessons from Others: Mutual Perceptions between Taiwanese and Korean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 Cold War

Choi, Mal-Soo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48, South Kore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two countries regarded each other as brotherly nations, jointly oppo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North Korea. Frequent exchanges occurred at both official and civilian levels, and literary interaction also developed within this context. Through organizations such as International PEN and writers' associations, mutual visits and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writers were promot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wo writer delegations that took place in 1957 and 1976. The former involved Korean writers visiting Taiwan, resulting in the publication *A Travelogue of Taiwan: Today's Free China*, which portrayed Taiwan's societal development and its image as Free China. The latter featured Taiwanese poets visiting Korea, leading to the publication *A Date with Snowflakes*, which expressed their impressions of Korean

culture and history. A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visits reveals that Korean writers in the 1950s focused primarily on Taiwan'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reflecting a clearly future-oriented perspective. In contrast, the Taiwanese poets in the 1970s viewed Korea through a lens of cultural self-reflection, presenting a past-oriented perspective. This contrast highlights the impact of changing times on Taiwan-Korea ex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and late Cold War period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dual aspects of anti-communist consciousnes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one hand, emphasizing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state superior to communist powers through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n the other hand, expressing nostalgia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damaged by communist regimes. Although these two stances differ in orientation, both are rooted in the anti-communist ideology of the Cold War era.

Key words: Cold War Period, Taiwan-Korea Literary Circles, Anti-Communist

Ideology, A Travelogue of Taiwan: Today's Free China, A Date with Snowflakes

「同病相憐」與「他山之石」 ——冷戰時期台灣與韓國文壇的 相互認識

一、冷戰時期台韓文壇的交流記實

1948年國共內戰進入尾聲，在首都南京陷落的傳言之際，中華民國與韓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¹。其後國民政府於1949年底撤守台灣，整個冷戰期間，中華民國與韓國互為兄弟之邦、血盟之友，共同對抗中共與北韓，彼此間都帶有強烈的反共同盟意識。1950年韓戰爆發後，兩國分別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中華民國於1954年／韓國於1953年），並建構了太平洋聯盟（1949年）²、亞洲民族反共聯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1954年）³等東亞集體安全

¹ 1948年8月，中華民國首任駐大韓民國大使劉馭萬向韓國大統領李承晚遞交了關於中韓建交的親筆信函，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由此，中華民國成為大韓民國首個建交國。

² 1949年3月20日，菲律賓總統艾爾比迪奧·基里諾（Elpidio Quirino）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出，亞洲應該成立一個太平洋聯盟。韓國大統領李承晚隨即響應，並於3月23日發表聲明，積極支持這一倡議。同年4月，為對抗以蘇聯為核心的共產勢力，數個西方國家簽訂了集體安全保障條約——北大西洋公約，並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NATO）。在此背景下，正處於國共內戰劣勢的蔣介石，為尋求美國的軍事援助，積極訪問菲律賓與韓國，並與兩國領導人展開會談。然而，這一聯盟構想最終因美國和印度的反對而未能實現。

³ 亞洲民族反共聯盟於1954年6月成立，旨在加強受共產主義侵略或威脅的亞洲民族之間的反共合作，並為自由亞洲的集體安全保障作出貢獻。該聯盟由八個國家和地區組成，包括韓國、中華民國、菲律賓、越南、泰國、香港、澳門和琉球。國共內戰的結局與韓戰的爆發，無疑成為美國主導的東亞反共聯盟得以強化的關鍵契機。然而，美國選擇與亞洲各國簽訂雙邊安全協議，而非建立區域性的集體安全體制。因此，亞洲民族反共聯盟最終未能發展為「亞洲版北約」。

體系。由於雙方皆視彼此為東亞命運共同體的盟友，並在政治、軍事與安全等領域積極推動交流。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員，在全球冷戰秩序下，兩國同為亞洲地區與共產勢力對峙的「鄰邦友國」與「反共盟友」，因此雙方的合作與交流自然順理成章。尤其在東亞冷戰初期的五〇至六〇年代，為了強化反共聯繫，兩國政府高層官員與軍方將領之間往來頻繁⁴。此後，民間交流亦日益活躍，涵蓋新聞、文化與教育等領域，例如反共青年團、新聞工作者訪問團、森林考察團、青年協會及韓中學生會等組織的成立，皆可見一斑⁵。

文學領域亦不例外。作為文化冷戰的重要機構之一，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E.N.）⁶的兩國分會，以及女作家協會與各類作家團體，皆曾透過互訪與作家會議促進交流。此外，兩國的文學發展也透過大眾媒體與文學雜誌的報導與刊載相互理解。關於兩國文壇交流的最早記載，可見於六〇年代的《聯合報》系列報紙⁷，然而，在此之前，個人或團體間的訪問亦時有發生。例如，1947年，韓國新聞工作者兼小說家宋志英（1916-1989）曾在台灣停留約四十天，親眼見證二二八事件後的動盪局勢。1957年，韓國多位重要文人與新聞工作者受自由中國反共亞洲聯盟之邀，以文化親善團身分訪問台灣兩週，期間參訪各大學、農村、工業區及金門，並拜會教育部長、政府官員及蔣總統。返韓後，翌年出版了《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1958）⁸，記錄此行見聞。其後，1965年5月，中國婦女寫作

⁴ 兩國元首曾多次會談，其中包括：1949年8月，蔣介石訪問韓國，與李承晚在鎮海會談；1953年11月，李承晚回訪台灣，與蔣介石舉行高峰會談；1966年2月，朴正熙赴台北與蔣介石會晤，討論韓國與中華民國的國土復原問題及反共合作方案。

⁵ 有關冷戰時期台灣與韓國之間的關係和交流，可參考以下論文：孫準植，〈從「兄弟之邦」到「凶地之邦」——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1948-1992）〉，《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8號（2013年6月），頁27-53；鄭文祥，〈冷戰時期韓國人對台灣的認識——以報紙對台灣關係的報導為中心〉，《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8號（2013年6月），頁87-103；南光奎，〈冷戰時期東北亞韓國與台灣關係的變遷過程與特徵分析〉，《韓國報勳論叢》13卷3號（2014年9月），頁39-60。文中所參考之韓國文獻書目，基本上皆忠實翻譯原文，後續亦將依此原則處理，故不另附韓文原文。

⁶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參考朴延熙，〈第29屆東京國際筆會大會（1957）及其冷戰文化史意義與視野——以1950年代後期美國文化援助與東西文化交流話語為中心〉，《韓國學研究》第49期（2018年5月），頁189-222。

⁷ 後續的交流記錄均以《聯合報》檔案為主要參考資料。

⁸ 關於這本書，可以參考以下研究：張世珍，〈悲傷的亞洲：韓國知識分子的亞洲旅行（1945-1966）〉（首爾：藍色歷史，2012年）；尹英賢，〈冷戰時期韓國社會對「自由中國（台灣）」的認識〉，《韓國學研究》第68期（2019年3月），頁119-164；張世琳，〈對趙炳華詩集《石阿花》（1958）中「台灣」認識的研究〉，《東岳語文學》第80期（2020年2月），頁

協會成員潘琦君（1916-2006）、蓉子（1922-2021）、謝冰瑩（1906-2000）等女性作家訪問韓國十天⁹。1976年，十位中華民國現代詩人組成訪問團赴韓交流，並將訪問感受整理成書，出版了《雪花的約會》（1978）¹⁰。1978年8月，葉維廉（1937-）造訪慶州，並於報刊撰文介紹當時導演胡金銓（1932-1997）正在拍攝的電影《空山靈雨》與《山中傳奇》¹¹，同時介紹了佛國寺、瞻星台、鮑石亭等拍攝場景¹²。

除了台灣文人訪問韓國之外，韓國詩人徐廷柱（1915-2000）也於1978年8月訪問了台灣。《聯合報》詳細介紹了他在韓國文壇的地位及其在不同時期的創作特色，並寫道：

對於友邦這樣一位大詩家、大文豪的訪華，我們的內心有著無比的興奮。中華民國現代詩壇將以最隆重、熱烈的聚會和吟宴歡迎這位貴賓，在此祝福他在台灣寶島有一個愉快的文學之旅！¹³

此外，1977年1月下旬，作家季季（1944-）在首爾停留了十二天，期間會見了多位文化界人士。回國後，她詳細介紹了從韓國藝術振興委員會委員長宋志英那裡聽取的韓國文學振興方案¹⁴。兩年後的1979年5月，宋志英再次訪問台灣，並與馮愛群（1924-1989）、王藍（1922-2003）、彭歌（1926-2025）、陳紀滢（1908-1997）、趙滋蕃（1924-1986）、林適存（1915-1997）等人進行了深入交流。

除了互訪以外，兩國作家還在國際筆會支持下的各類作家會議中相遇，互相對反共的認知及文學的社會功能進行深入的交流¹⁵。相關報導可依時間順序概述

49-83。

⁹ 不著撰者，〈三女作家 赴韓訪問〉，《聯合報》，1965年5月10日，第2版。報導中的中國婦女寫作協會應是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誤記，該組織於1969年更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

¹⁰ 羊令野等著，《雪花的約會》（台北：天華出版社，1978年）。為清耳目，以下引文在文末直接括弧書名簡稱《雪花》及頁數。

¹¹ 這兩部經典電影均在慶州取景拍攝，並於1979年正式上映。

¹² 葉維廉，〈慶州行〉，《聯合報》，1978年8月1日，第12版。

¹³ 陳寧寧，〈綻開的菊花——歡迎韓國大詩人徐廷柱先生訪華〉，《聯合報》，1978年8月25日，第12版。

¹⁴ 季季，〈他山之石——側寫韓國文藝振興院院長宋志英先生〉，《聯合報》，1979年6月18日，第12版。

¹⁵ 1978年，韓國筆會邀請亞洲各國筆會會長齊聚首爾參加會議。

如下：1970年6月15日至19日，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¹⁶在台北舉行，韓國代表團由小說家朴鍾和（1901-1981）擔任首席代表，共十三人出席¹⁷。會議圍繞民族文學的發展、小說的地位、現代詩、散文與戲劇、大眾媒體的運用與濫用、亞洲語文翻譯，以及亞洲作家面臨的困境等議題，進行了三場討論。此次會議規模宏大，由國際筆會支持，共吸引來自亞太地區的兩百多名作家參與，其中包括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1899-1972），引發廣泛關注¹⁸。在《聯合報》「三三草」專欄中，彭歌發表〈韓國的作法〉一文¹⁹，提及國際筆會主辦的世界作家會議預計於六月底在韓國首爾舉行。他指出，韓國當時正積極推動經濟、體育及文化建設，其中文學發展尤受重視。韓國代表在介紹本國文學對外翻譯的現況時，倡議亞洲各國文學作品應相互翻譯，並具體提議成立亞洲翻譯中心。他引用朱耀燮的言論，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行的韓國雜誌、國際筆會會報及英文《韓國時報》均陸續刊載英文翻譯的韓國短篇小說。因此，他建議可借鑑韓國經驗，選擇優秀的文學作品，以英文推向國際。

在國際筆會的支持下，繼菲律賓和泰國之後，台灣也成功舉辦了亞洲作家會議。本次會議旨在促進亞洲作家間的團結與合作，並對來自共產國家地區的流亡作家提供特別關照。作為美國主導的文化冷戰項目之一，會議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亞洲作家會議之後，1970年6月27日，國際筆會的年度活動——第三十

¹⁶ 亞洲作家會議起源於1961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第31屆國際筆會大會，當時由菲律賓代表提議創辦。首屆大會於1962年在菲律賓舉行，台灣派出10名代表參加，韓國則派出5名代表；第二屆於1964年11月24日在泰國曼谷舉行。除文中提及的第三屆會議外，第四屆會議於1976年4月26日至5月1日，在台北以「三十年來動亂中的亞洲文學」為主題舉行。

¹⁷ 其他與會人員包括：小說家朱耀燮（1902-1972）、安壽吉（1911-1977）；詩人柳根周（1927-2001）、金長好（1929-1999）、楊明文（1913-1985）；評論家趙演鉉（1920-1981）、張伯逸（1933-2009）；劇作家金貞淑（1949-）；《朝鮮日報》文化部長李一東；翻譯家梁炳鐸（1922-？）等人。

¹⁸ 有關此次會議，除《聯合報》、《中央日報》等日報有所報導外，《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亦有詳盡記載。例如，該雜誌特別策劃了「亞洲作家會議專輯」，刊登了穆中南以中英文撰寫的〈對亞洲作家會議的期望〉，此外還有〈出席友邦作家芳名錄〉以及彙整多位作家意見的〈我們對文學的意見〉等內容。穆中南，〈對亞洲作家會議的期望〉，《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頁4-5。不著撰者，〈出席友邦作家芳名錄〉，《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頁6-8。不著撰者，〈我們對文學的意見〉，《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頁9-17。

¹⁹ 彭歌，〈韓國的作法〉，《聯合報》，1970年6月27日，第9版。

七屆世界作家會議於首爾召開，台灣亦派遣文藝界人士參與²⁰。除了會議活動外，代表團還參觀了釜山、蔚山工業區以及慶州佛國寺等地²¹。彭歌在〈所知與所感〉²²一文中報導了此次大會，指出共有來自二十六個國家的一百多名代表出席，會議持續六天。會中，中國筆會會長林語堂（1895-1976）與韓國筆會會長白鐵（1908-1985）同時當選為國際筆會副會長。此外，會議決議將台北方面先前提出的翻譯中心計畫付諸實施，在首爾設立「亞洲筆會翻譯局」，並出版《亞洲文學》雜誌²³，同時確定下屆會議將於愛爾蘭都柏林舉行。這次大會給彭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8月22日的〈長他人之勢〉²⁴一文中回顧韓國的文化發展，特別讚賞韓國政府與民間對文化活動的熱情與支持。他指出，會議期間，《東亞日報》捐贈了三萬美元，顯示出韓國在文化藝術與體育方面的支持力度遠遠超越台灣，這正是台灣應當學習與借鏡之處。

接著，1978年5月1日，由亞洲文化中心主辦，以「當代亞洲的文學與社會」為主題，在台北舉行了為期三天的亞洲文學會議。來自韓國的趙演鉉、吳學榮（1938-1988）、金秉權（1931-2023）等人參加了此次會議。其中，趙演鉉曾五次訪問台灣，並在國際筆會主辦的多次會議中頻繁與台灣作家會面，顯得非常熟悉。亞洲文化中心是亞洲國會議員聯合會的下屬組織，並且在1976年曾舉辦過第二屆亞洲學者會議。為了進行更深入的討論，特別舉辦了該文學會議。此外，1979年由中韓文化基金會與淡江文理學院共同主辦的第一屆中韓文學會議，於7月27日至29日在台北舉行，旨在探討台灣與韓國兩國的文學發展與交流。台灣方面的與會者包括杜松柏（國立中興大學）、尤信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施淑女（淡江文理學院）、廉永英（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沈謙（幼獅學誌）、李超宗（黎明文化公司）、龔鵬程（淡江文理學院）等人；韓國代表團由鄭範錫率領，與會成員包括車柱環（首爾大學）、池榮在（檀國大學）、李慶善（漢陽大

²⁰ 根據韓國《中央日報》的報導，此次大會的韓國代表包括張旺祿（1924-1994）、皮千得（1910-2007）、黃順元（1915-2000）、李根三（1929-2003）、金東里（1913-1995）、金恩國（1932-2009）等作家，而台灣代表則有林語堂、陳紀澄、王藍等人參與。

²¹ 陳紀澄，《國際筆會與亞洲作家會議》（台北：重光文藝，1978年），頁27-29。

²² 彭歌，〈所知與所感〉，《聯合報》，1970年8月17日，第10版。

²³ 《亞洲文學》此後在十年間共出版了三期。

²⁴ 彭歌，〈長他人之勢〉，《聯合報》，1970年8月22日，第9版。

學)、申東旭(高麗大學)、全光鏞(首爾大學)、金一根(建國大學)、金東旭(延世大學)等,共計十二位學者。他們共舉行四場會議,發表關於各自文學的論文,並進行意見交流。會議主要從兩國文化與當前處境的相似性出發,強調相互進行文學研究與理解的必要性。在「促進兩國文化交流與學術界溝通」的主題下,討論重點聚焦於中韓文學的比較研究以及韓國文學的對外關係。從與會學者的背景可見,這些學者的參與反映了自五〇年代以來兩國大學間教授與學生交流計畫的累積成果與經驗²⁵。

同時,台灣的大眾媒體與文學雜誌也積極介紹韓國文壇、作家及其作品。首先,根據《聯合報》專欄記載,1975年6月13日,彭歌在〈韓國爭取諾貝爾〉²⁶一文中提及,他多次訪問韓國期間結識了許多文學界人士。當他詢問韓國是否有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時,許多人一致推薦了安壽吉此外,彭歌還引用了1975年6月9日出版的《新聞週刊·潛望鏡》的報導,指出韓國當時正積極推動新的文化策略,目標直指諾貝爾文學獎。為此,韓國文學作品正被大量翻譯成英語和法語,其中,黃順元的《該隱的後裔》(1953)和朴景利(1926-2008)的《金藥局的女兒們》(1962)被視為這一文化攻勢的重要成果。負責韓國文學翻譯的是韓國外國語大學的鄭寅燮(1905-1983)博士,彭歌認為,由他主導的韓國筆會作家會議在外語翻譯方面水準甚高,這得力於韓國政府的積極支持與經費援助。更重要的是,國際筆會亞洲作家翻譯中心設於首爾,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專家參與,為韓國的文化推廣奠定了堅實基礎,並取得了明顯成效。當時,台灣的《中國筆會季刊》是唯一的英文期刊,因此希望借鑑韓國的經驗與努力。此外,1978年8月25日,韓國詩人徐廷柱訪問台灣,陳寧寧特別撰寫〈綻開的菊花:歡迎韓國大詩人徐廷柱先生訪華〉²⁷,詳細介紹徐廷柱自1936年出道以來詩作的四個發展

²⁵ 參與會議的多數韓國學者皆曾在台灣進修或進行短期研究,而台灣學者周何、汪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秋山(中國文化大學)、王蘇、王仁鈞(淡江文理學院)等人也曾在韓國的大學任教。當時,國立政治大學、淡江文理學院、輔仁大學與東海大學均與韓國多所大學推動教授與學生交流計畫。

²⁶ 彭歌,〈韓國爭取諾貝爾〉,《聯合報》,1975年6月13日,第12版。

²⁷ 陳寧寧,〈綻開的菊花——歡迎韓國大詩人徐廷柱先生訪華〉,《聯合報》,1978年8月25日,第12版。

階段及其變化，並翻譯了〈菊花旁〉（1947）、〈觀無等山〉（1954）及〈歸蜀道〉（1943）等詩作。

以上簡要回顧了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冷戰時期，台灣與韓國文壇在作家互訪、作家會議及台灣媒體對韓國文學的介紹等三個方面的交流情況。總體而言，在冷戰初期的三十年間，兩國透過政府層面的正式訪問團邀請、國際筆會主導的亞洲作家會議及世界作家會議等活動，頻繁展開互動。這些活動雖以宣揚世界和平及區域間的相互理解為名，但實質上仍延續了對抗共產陣營的文化冷戰基調。

二、「韓國文化親善團」與《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 五〇年代韓國文人的台灣印象

正如前節所述，冷戰時期自由中國（台灣）與韓國之間的文學交流相當頻繁。然而，由於多數紀錄僅以簡短新聞報導的形式留下，難以找到詳細的相關資料。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找出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兩國作家團的互訪記錄，並以此為基礎，探討冷戰時期兩國之間的具體交流情形與相互認識的過程。本節首先將考察 1957 年韓國文化親善團訪問台灣的經過，以及次年在韓國出版的訪問記《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²⁸。韓國文化親善團由作家、新聞從業者等十二人組成，應亞洲反共聯盟中國總會之邀²⁹，於 1957 年 12 月 3 日至 18 日展開為期兩週的訪台行程，並走訪台灣各地。根據當時的報導³⁰，原定行程延長了五天，期間訪問團與作家組織、中韓文化協會、文藝協會等機構舉行了座談會與講演會。此次訪問在兩國反共聯盟的推動下，旨在透過文化合作履行反共任務。五〇年代，台韓兩國的交流主要集中於政治、外交與軍事領域，即使涉及文化層面，也多以個人名義³¹或圍棋等體育活動為主。在此背景下，不難看出此次訪問團的核心目標是加強文化層面的反共合作。

²⁸ 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

²⁹ 根據韓國亞洲反共聯盟成員、同時也是訪問團參與者的吳謹所述，此次訪問是由韓國方面主動向中國聯盟探詢訪問的可能性後，雙方共同促成的重要交流活動。

³⁰ 不著撰者，〈韓國文化團 訪程延五天〉，《聯合報》，1957年12月12日，第3版。

³¹ 例如，五〇年代台灣的文化界人士朱家驊、董作賓、溥儒等曾應韓國學界的邀請進行訪問。

此次訪問團陣容堅強，匯聚了韓國文壇的重要作家，包括宋志英、鄭飛石（1911-1991）、趙炳華（1921-2003）、朱耀燮、李無影（1908-1960）、金容浩（1912-1973）、趙敬姬（1918-2005）、田淑姬（1919-2010）等人。此外，媒體界的金東翼、金哲、金鎮燮等資深工作者也隨團同行。值得一提的是，亞洲反共聯盟韓國總會的吳權亦參與其中，為此次訪問增添了更多代表性與影響力。在為期兩週的緊湊行程中，訪問團不僅拜會了蔣介石總統、陳誠副總統、教育部長張其昀等政府高層官員，還參訪了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臺灣省立成功大學等高等學府。此外，他們也深入高雄的國營工廠、桃園的農家，並遊覽了日月潭等風景名勝，甚至親臨軍事最前線的金門。此行中，訪問團還與台灣文壇的重要人士進行了多場講座、座談會及討論會，雙方就兩國文學的發展與現狀展開了深入交流，進一步促進了彼此的文化理解與互動³²。由於反共聯盟精心安排各項訪問行程，所有成員皆表示滿意。他們不僅會晤政府官員，還深入參訪工業、教育、農村、軍事等社會各個領域，充分展現官方層面的宣傳意圖。與此同時，參與人士似乎也意識到這一點，並盡可能透過實地觀察，深入了解台灣的真實情況。

1958年，訪問次年，出版的《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收錄了參訪成員所寫八篇文章。其中，除代表反共聯盟的吳權外，其餘皆為作家，各自從不同角度記錄了訪台經歷。然而，由於他們在相同的行程中接受了統一的導覽，整體印象大致相似。正如既有研究所指出，書中將自由中國描繪為發展程度超越韓國的國家，並視其為值得效法的盟友³³。除了作家們的訪問感想外，該書的前言還收錄了時任駐韓中華民國大使王東原的序言，以及教育部長張其昀的〈花郎精神〉

³² 這一消息同樣在韓國媒體中獲得多方報導。如：不著撰者，〈社論：讚美自由中國〉，《朝鮮日報》，1957年12月26日，第1版。

³³ 尹英賢在〈冷戰時期韓國社會對「自由中國（台灣）」的認識〉中指出，參加者幾乎描述了相似的內容，並將其總結為10個要點如下：1. 台灣是一個比南韓更發達的國家。2. 台灣沒有乞丐。3. 台灣的食物和電力供應非常充足。4. 由於土地改革的成功，農村生活非常富足。5. 在政府的巨額財政支持下，教育政策完善，學費低廉。6. 有能且清廉的行政官員在執行國家的政策。7. 不論地位高低，甚至學生，所有人的穿著都非常簡樸，毫無奢侈之風。8. 台灣仍然經常使用日語（與韓國不同）。9. 金門是東亞反共的最前線，也是非常崇高的地方。10. 看到東亞自由陣營的偉大領袖蔣介石總統，感動得幾乎流下眼淚。尹英賢，〈冷戰時期韓國社會對「自由中國（台灣）」的認識〉，《韓國學研究》第68期（2019年3月），頁119-164。

(1958)一文。這顯示出，這次訪問團不僅是單純的民間交流，更帶有官方色彩，屬於政府層級的正式活動。根據王東原的序言，參與訪問的文人回國後，紛紛在各大報紙和雜誌上發表了他們的感想。如今，這些文章被彙編成書，出版為訪問記，旨在促進中韓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與理解。此外，王東原特別提到，寶島台灣是實踐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的典範，並在反共抗俄與民族復興的基礎上，致力於政治革新、農村改革、軍隊整編與訓練、工業建設以及民生改善等多方面的努力。訪問團對此進行了深入觀察，並表達了他們的深刻感受。張其昀則指出，韓國在經歷長期的日本殖民統治後，已成功擺脫屈辱與仇恨，重建了國家尊嚴，並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將驅逐蘇聯共產勢力，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他特別提到 1953 年 1 月 23 日³⁴，韓國時任大統領李承晚釋放反共義士回國的偉大行為，並強調這段爭取自由的歷史，將永遠銘記於中韓兩國後代子孫的心中。

作家們無一例外地記錄了他們的觀感，普遍認為自由中國與韓國同為對抗共產勢力、維護自由的兄弟之邦，他們的描述皆基於這一立場。曾於 1947 年訪台的作家宋志英³⁵，以台灣社會在十年間的變化為重點，展現了獨特的視角。他特別指出，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的混亂氣氛已不復存在，尤其是曾經雜亂無章的高雄，如今已發展成比台北更為整潔的城市³⁶。宋志英在日據時期曾於南京中央大學求學，對中國歷史與文化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且能流利使用中文，因而能夠向其他作家傳達相關知識，甚至擔任翻譯。他在訪問期間敏銳地察覺到台灣人普遍流露出的「憂鬱心理」與「深切的鄉愁」³⁷，並推測這可能與意識到單憑自身力量難以實現反攻大陸的現實有關。同時，他也觀察到，雖然十年前嚴重的省籍衝突已有所緩和，但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情感裂痕仍未完全彌合。對於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的失利以及知識分子撤退至台灣的歷史背景，他展現出比其他人更為深刻的理解，這或許與他早年在中國的經歷以及多次訪問台灣的經驗有關。

³⁴ 該書誤記為 1954 年。

³⁵ 根據訪問的時間點推斷，宋志英此次訪問應是在 1956 年擔任「希望社」總編輯期間進行的。此後，他多次往返台灣，總計訪問次數達十一次之多。

³⁶ 宋志英，〈自由中國的今日〉，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 年），頁 21-48。

³⁷ 同註 36，頁 26-28。

他分析台灣發展的關鍵因素，包括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農村經濟的穩定以及外國援助的有效利用，特別是土地改革的成功，使農村經濟得以穩固發展。他進一步強調，台灣應將韓國視為「反共的自由民主」兄弟國，同時他也呼籲韓國應該更多地了解自由中國的現狀。此外，他在描述金門島時，將中國大陸比喻為「赤流沖刷下民生號哭之地」，明確表達了對國民政府反攻大陸政策的支持立場³⁸。

小說家鄭飛石表示，他期望透過公務視察與私人探索來深入觀察台灣。結果，他發現自己過去對台灣的認知存在誤解，曾以為台灣是一個由腐敗政權統治的未開發國家。然而，實際走訪後，他意識到台灣是一個比韓國更為進步且宜居的國家，甚至認為台灣是韓國值得學習的榜樣。他細膩地描繪了台灣的景象，例如「沒有乞丐與茅草屋，樹木繁茂，警察稀少，大學生衣著樸素，不吸煙，計程車數量不多，公共場所整潔，火車不分等級，也沒有嚴厲處罰的標語。」³⁹並將這些觀察與韓國的情況進行對比。透過這種比較的視角，他不僅關注台灣民眾的素養與生活態度，更進一步提出台灣在國家政策層面的經驗，值得韓國借鑑與改進。例如，他特別指出台灣繁榮的動力來源，包括國營工廠的盈餘及其推動的工業發展、土地改革成功帶來的農村振興、政府高效的行政能力、市民普遍的守法精神，以及美國經濟援助的有效運用。他強調，作為共同面對共產勢力威脅的命運共同體，韓國應增強自身實力，以建立更堅實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在這方面，他讚譽台灣不僅是可靠的盟友，更是國政發展的典範。

擔任文化親善團團長的小說家兼詩人朱耀燮指出，教育普及與經濟穩定是國家發展的關鍵要素，而台灣在這兩方面已取得平衡並步入正軌。他特別強調，地方政府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九被強制用於教育，小學實施免費教育，中等以上學校的學費也極為低廉，教師更享有住房保障，這些措施共同推動了教育的穩健發展⁴⁰。詩人金容浩在台灣觀察到經濟穩定與自律公共道德的顯著成果。他指出，

³⁸ 同註 36，頁 31-32。

³⁹ 鄭飛石，〈連貪官與灰塵都消失的台灣〉，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 53-54。

⁴⁰ 朱耀燮，〈教育普及與經濟安定〉，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 89-108。

經濟穩定的具體表現包括農田的整頓、社會上幾乎沒有乞丐，以及國營工廠的持續盈餘。而在公共道德方面，他特別提到台灣民眾普遍養成不吸洋煙的習慣，偏好使用國產商品，並傾向於以自行車和三輪車代步而非汽車。此外，街道的整潔與良好的治安也讓他印象深刻⁴¹。女性作家趙敬姬在來台之前，對中國在腐敗政權下的逃亡生活抱有成見。然而，親眼目睹台灣乾淨的城市環境、完善的道路建設、有序的交通網絡以及整齊的交通工具後，她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她表示，透過台灣人對國產商品的支持與簡樸的生活方式，她深刻體會到台灣是一個經過改革與實踐，成功擺脫腐敗陰影的國家⁴²。

訪問團成員對國民政府的主要政策——土地制度改革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一致給予高度肯定，這主要是基於他們以韓國的農村現狀作為對比基準。國民政府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三大政策，其核心在於將農地分配給農民，並以有價證券作為對地主的補償。訪問團成員普遍認為，這項政策之所以被視為成功，是因為它不僅滿足了農村與城市的經濟穩定需求，更符合工業化時代的發展要求。當時的韓國雖自 1950 年起推行土地改革，使佃農或無地農民得以擁有少量土地，但由於農村人口過剩與長期債務問題，農村經濟仍面臨嚴峻挑戰。正因如此，訪問團成員對台灣的土地改革政策深感欽佩，認為其成效顯著，值得借鑑。被譽為農民作家的李無影認為，台灣的農村政策正是韓國應當學習的典範。他指出，儘管韓國通常會派遣人員前往美國進行農業考察，但由於農地規模與耕作方式的巨大差異，往往只能感受到對先進農業的自卑，而難以獲得具體可行的建議。因此，他主張，若韓國希望尋求農業改善的方案，就應派遣專家前往台灣進行實地考察，以汲取更貼近實際需求的經驗與啟發⁴³。他進一步指出，台灣的農民能夠透過銷售農產品來支付子女的教

⁴¹ 金容浩，〈確立的自主公共道德〉，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145-154。

⁴² 趙敬姬，〈自由中國的新風土〉，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155-168。

⁴³ 李無影，〈台灣通信〉，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109-143。他說：「參觀台灣後，我們也堅信，只要努力約三年，就能建設出全新的農村。與其將國庫資金用於美國農村考察，不如派遣十幾名人員前往台灣學習經驗。」，頁129。

育費用，並購買縫紉機等工業產品，过上相對富裕的生活。然而，這種情況在韓國幾乎不存在。他還說：

在台灣農村，透過將每 12 戶設為一個社區，對每個社區每年三次進行低利貸款審核，並以六年分期付款的方式提供土地給佃農，這些措施都是我們未曾設想過的。然而，台灣成功運用了這些方法，而我們卻未能做到。歷任農政負責人只會高喊口號，如「中農」或「農業第一」，但從未真正實現讓農民僅靠賣一頭豬就能供子女上京的農村發展。⁴⁴

他進而質疑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調控、美國援助資金的用途等政策的有效性。不僅如此，他還批評了國營企業的經營方式與效率，以及韓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差別意識與奢侈風氣。相比之下，他舉例說明台灣社會的不同之處，例如：台灣的火車沒有等級之分，公務員無論職位高低都與市民同坐一個車廂；不吸煙成為普遍風氣；即便能夠自給自足汽油，汽車使用量仍然很少。這些現象促使他反思韓國社會的階級意識與過度消費文化。

對他們而言，台灣既是值得借鑑的榜樣，也是與共產勢力對峙的軍事盟友與命運共同體。在蔣總統的接見與金門島的視察過程中，所有人都強調了反共合作的重要性。特別是在作為最前線軍事據點的金門島，親眼目睹中國共產黨政權帶來的威脅，使他們更深刻體認到自由的可貴。這些經歷，進一步促使他們將台灣的處境與韓國相對照，強化了對反共合作與共同防禦的迫切需求。詩人趙炳華在〈頌·蔣總統〉一詩中，盛讚蔣總統為：「與無情的野蠻共產主義者作鬥爭的長者」、「與蘇聯共產國家對抗的領袖」、「解放東方於歷史侵略中的偉人」、「實踐反共民族革命的偉大亞洲領袖。」⁴⁵在〈金門島〉中，他將金門讚譽為「自由的堡壘／亞洲的聖城／遠東的槍頭堡／保護全自由亞洲市民的不眠島」，並稱頌台灣為「我們的盟友——自由中國的炙熱心臟／我們的盟友——自由中國的愛之城牆／我們的盟友——自由中國的不朽意志」。他更向中國人民呼喊：「同胞們！善

⁴⁴ 同註 43，頁 128。

⁴⁵ 趙炳華，〈頌·蔣總統〉，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 年），頁 80-81。

良的同胞們！來到自由的國度！／打破組織，尋找人性，這裡是自由的國度，人性的國度！／反共抗俄民族的國度，同胞的歸屬！」⁴⁶在趙炳華的詩作中，他透過對比的修辭手法，如束縛與自由、侵略與解放、惡劣與善良、組織與個人、非人與人，將中國共產政權與自由中國形成強烈對立。他運用極具感染力的語言，如「炙熱的心臟」、「愛的城牆」、「不朽的意志」等，不斷強化大眾對中國的心理戰內容，並展現了從金門到自由中國，再擴及遠東、東方乃至整個亞洲的反共戰線，體現出典型的冷戰認知與情感。蔣總統作為國共內戰的親身經歷者，金門作為最前線的軍事據點，無疑在韓國文人的反共意識中扮演了關鍵的召喚媒介。此外，宋志英也提及此次訪問的邀請方——亞洲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⁴⁷，並對其在亞洲各國積極推動反共聯盟事業表達敬意，特別強調他在自由中國推廣反共理念、深化民眾認同方面的重要貢獻。

除了再次確認台灣視察與反共盟友之間的關係外，作為文化友好團的一環，訪問團還與台灣文學界人士進行了多次深入交流。宋志英在台南偶然遇見了「多年來保持深厚文學交流」的女性作家張漱菡（1929-2000），但遺憾未能與時任國立成功大學教授的蘇雪林（1897-1999）會面。此外，宋志英回提到，在中國文藝協會與青年寫作協會舉辦的茶敘會上，與來自政界、學界、媒體界、文學界及藝術界的多位人士交流，這些場面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他回憶道：「活動結束後，我們因不願與他們分開，六、七人圍坐在一起，隨意交談，這是一場讓人難以忘懷的聚會。」⁴⁸他還提及，訪問團與婦女寫作協會的會員們互相交換著作，並達成共識，認為要促進兩國相互理解，文學作品的交流、翻譯與出版至關重要。

相較於其他人，李無影對文學界交流的記錄更為詳盡。他不僅回憶了與前述幾個文人團體的互動，還特別提及與個別作家的會面經歷。他提到，在外交部長的招待晚宴上，他結識了陳紀澄，兩人同為農民作家，彼此間有著深刻的共鳴。

⁴⁶ 趙炳華，〈金門島〉，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81-85。

⁴⁷ 谷正綱被譽為「反共鐵人」，長期擔任亞洲自由國家聯合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以及世界人民反共聯盟主席等職務，畢生致力於反共事業。

⁴⁸ 宋志英，〈自由中國的今日〉，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48。

此外，李無影也記錄了陳紀澄對黃色文學的憂慮。當時，台灣正推行以根除赤色、黑色、黃色文學為目標的文化清潔運動，政府積極致力於清除色情文學，以淨化文化環境。李無影表示：

我們的文教部長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了「道德教育」⁴⁹，對此寄予厚望。然而，在日本，甚至連讀者和出版商都因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而被罰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向自由中國學習。⁵⁰

透過台灣文學界的視角，他反映了韓國當時的文化與出版環境。陳紀澄是極具代表性的反共作家，並長期領導中國文藝協會，曾是台灣文壇的核心人物。韓國文化親善團抵台後僅短短兩天內，便進行了四至五次會談，顯示出雙方極為緊密的文化交流。中堅作家穆中南（1912-1992）在會面時，對於台灣與韓國同樣推動純文學、打擊黃色文學的現況，寫下「同病相憐」四字，並與與會者達成共識，認為應共同致力於防共、防黃。在與青年寫作協會的座談會上，雙方分別介紹了各自文壇的現狀，並針對詩文學、小說文學等領域展開深入討論⁵¹。而在與王平陵（1898-1964）、林適存等資深作家的交流中，韓方驚訝地發現台灣文壇對韓國文學的了解極為有限。例如，有人誤認韓國文學承襲自日本文學的傳統，甚至詢問若未來日本再次侵略韓國，韓國文學將如何處理與日本文學傳統的關係等問題。此外，雙方還討論了具體的交換方式，以互相刊登台灣文學雜誌《文藝創作》⁵²與《文壇》⁵³，以及韓國《自由文學》⁵⁴中的作品。在交流過程中，他們發現台灣的作家多數擔任國會委員或政府官員等公職，這點與韓國文壇的情況有所不同。

⁴⁹ 1957年11月，崔在裕接任第六屆韓國文教部部長，開始推動道德教育教科書的國有化政策。

⁵⁰ 李無影，〈台灣通信〉，收錄於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頁111-112。

⁵¹ 同註50，頁113。

⁵² 這份文學雜誌由國民黨中央黨部主辦，於1951年5月4日正式創刊，至1956年12月停刊為止，共發行了68期。雜誌的發行人為張道藩，歷任編輯團隊包括葛賢寧、胡一貫、王平陵、虞君質等人。由於該雜誌已於1956年停刊，部分資料可能存在誤差或遺漏。

⁵³ 這份純文學雜誌於1952年6月創刊，持續發行至1985年11月。雜誌由穆中南擔任發行人，並由王藍、劉枋（1919-2007）等人參與編輯工作。

⁵⁴ 這份雜誌於1956年6月創刊，作為韓國自由文學者協會的機關刊物，持續發行至1963年8月第71期後停刊。雜誌由金基鎮（1903-1985）擔任編輯兼發行人，宋志英擔任主編，金利錫（1914-1964）則為編輯長，是當時文學界的重要刊物之一。

這種差異主要源於當時台灣文壇的主流作家多來自中國，他們不僅是文學創作者，同時也是推動反共文學政策的制定者。

根據李無影的記錄，韓國文化親善團成員在多個地區與當地文人協會舉行座談會，並與主要作家進行了多次深度交流，這樣的互動應有助於雙方加深理解。例如，在基隆舉行的文學鼎談中，與會者確認中國新文學在啟蒙、抗日、抗俄等方面的目的意識，與韓國文學的發展脈絡並無二致。然而，他們也對當前中國文學過於強調目的意識而可能導致創作片面化的問題表示憂慮，這一觀點亦獲得台灣作家的認同，並達成共識，認為應透過活躍的批評文學來尋求解決之道。當時的台灣文壇正努力擺脫反共文學的教條束縛，探索能夠真正觸動讀者情感的創作方法，而韓國文壇似乎也關注著相同的議題。

趙炳華也在返國後，出版了詩畫集《石阿花》⁵⁵，其中記錄了他對台灣之行的感受，包括前文提及的兩首詩。在〈詩人的邀請〉一章中，他詳述了與中國文藝協會詩人的會面情景。他收到的台灣詩人親筆簽名包括上官予（1924-2006）、紀弦（1913-2013）、覃子豪（1912-1963）、鍾鼎文（1914-2012）、余光中（1928-2017）、蓉子（1922-2020）、羅門（1928-2017）、戴蘭村（1924-2011）、鍾雷（1920-1998）、方思（1925-2018）等，這些詩人不僅是五〇年代中期現代詩現代主義運動的重要推動者，也都來自中國大陸。儘管他們反對過於公式化的反共內容或口號式的朗誦詩，仍堅守反共文學的基本立場，並致力於推動中國新詩的現代化。這顯示出，兩國文人的交流依然在反共文學的框架內展開。

三、「中華民國現代詩人訪問團」與《雪花的約會》：七〇年代台灣文人眼中的韓國文學

繼五〇年代韓國文人訪台的記錄之後，本節將聚焦於七〇年代台灣現代詩人訪韓的詩文集《雪花的約會》⁵⁶。這部作品源於1976年11月25日，中華民國現

⁵⁵ 趙炳華，《石阿花：趙炳華詩集》（首爾：正音社，1958年）。這本詩畫集於首爾出版後的隔年，由台灣著名作家柏楊（本名郭衣洞，1920-2008）翻譯成中文，並由中國文學出版社發行中文譯本。

⁵⁶ 羊令野等著，《雪花的約會》（台北：天華，1978年）。

代詩人訪問團應韓國筆會之邀，赴韓進行為期一週的交流活動後所出版。詩文集不僅收錄了台灣詩人的訪韓感想，還附錄了韓國詩人徐廷柱、趙炳華、金良植（1931-）、洪潤基（1933-）、黃東奎（1938-）等人的詩作翻譯。參與此次訪問團的台灣詩人包括羊令野（1923-1994）、洛夫（1928-2018）、羅門（1928-2017）、張默（1931-）、辛鬱（1933-2015）、楚戈（1931-2011）、商禽（1930-2010）、菩提（1932-）、梅新（1937-1997）、方心豫（1940-）等，其中多數為《藍星》與《創世紀》詩刊的成員。這些詩人皆是五〇至六〇年代推動中國新詩現代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以其現代主義風格引領了當時的詩壇潮流。

他們以散文與詩記錄了對韓國歷史的印象，並介紹了韓國文壇的多位詩人及其作品。這本書不僅是一次訪問的紀錄，更可視為文學交流的重要成果。在序言中，該詩文集被評價為文藝界海外訪問的集體創作，並被譽為中韓文學交流的首個重要成果。此次訪問的目標在於透過文學促進中韓詩人之間的友誼。其中，一些訪問記錄在台灣出版前，已由中文學者兼詩人許世旭（1934-2010）譯為韓文，並刊載於韓國的文學雜誌⁵⁷。訪問日程則可透過詩人張默以日記形式撰寫的文字加以確認，簡要整理如下：

- 11月25日：抵達首爾，拜訪中國大使館，與韓國筆會的全光鏞（1919-1988）、小說家宋堯仁（1932-1989）等二十多位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會面。
- 11月26日：拜訪《東亞日報》和《韓國日報》，參觀詩人韓龍雲（1879-1944）之墓，南山遊覽，參觀金素月（1902-1934）詩碑，拜訪徐廷柱宅並共進晚餐。
- 11月27日：觀賞首爾街景，參加中國大使館主辦的晚宴，出席者有趙炳華、許世旭等。
- 11月28日：前往春川旅行。

⁵⁷ 許世旭於1959年畢業於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1963年獲得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碩士學位，並於1968年取得中國文學博士學位。他積極促進台韓文人之間的交流，並在兩國詩歌的互譯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此外，此次訪問的促成與行程安排亦離不開他的努力，為台灣與韓國文壇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 11月29日：參觀民俗村，與《韓國文學》月刊主編李根培（1940-）、詩人權逸松（1933-1995）等四人舉行座談會。
- 11月30日：參觀景福宮等古宮，受邀到詩人金良植宅，參加趙敬姬、崔貴童（1927-）、許世旭等的聚會，參加大使館主辦的晚宴及中韓詩人朗誦座談會，出席的韓國作家有李昌培（1916-1983）、趙炳華、許世旭、金良植、楊明文、洪潤基、崔貴童、申東春（1931-2014）、權逸松、金宗文（1919-1981）、釋志賢（1946-）等二十多位。
- 12月1日：參觀華僑中學和板門店，晚上拜訪韓國文人協會，與趙演鉉會長進行交談。
- 12月2日：返國。

由於此次訪問是應韓國筆會之邀，大部分行程顯然聚焦於文人間的交流。然而，當詩人們在板門店親眼目睹南北韓對峙的緊張局勢後，不禁聯想到台灣的處境，紛紛流露對戰爭的恐懼與日益強烈的反共意識。這也顯示出，七〇年代後期的文學交流仍然是在反共的框架內展開。

這本詩文集收錄了所有參訪者的詩作，儘管篇幅長短不一，但每人的作品皆得以呈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詩人們透過韓國的景致，深切表達了對中國大陸故鄉的思念之情。從他們下榻的雲堂旅館⁵⁸的建築風格，到景福宮等宮殿、石碑、石塔和寺廟，處處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痕跡。此外，寒冷的氣候以及春川和民俗村的雪景，也讓他們感受到濃厚的中國韻味。

訪問團團長羊令野在目睹雪景時，感慨彷彿置身於王維的畫境之中，喚醒了深藏已久的鄉愁。儘管首爾是異鄉，但北地的雪景讓他體會到柳宗元「獨釣寒江雪」⁵⁹的意境。不僅在首爾，前往春川的途中，他們也屢次聯想到王維。春川湖

⁵⁸ 這座建築原為朝鮮朝純祖時期所建的朝鮮後期內官宅邸，位於鍾路區雲尼洞，後改建為舊旅館。韓戰結束後，由伽倻琴竝唱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持有者朴貴姬接手，並將其命名為「雲堂」，重新改建為旅館對外營業。雖然現已拆除，但自1958年《東亞日報》主辦的國手賽決賽首次在此舉行後，此地便被譽為圍棋聖地，成為圍棋界的重要地標。

⁵⁹ 此句出自唐代詩人柳宗元的《江雪》，全詩如下：「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這首詩以簡潔的筆觸描繪出一幅孤寂的冬日江景，展現了詩人超然物外的情懷與對自然的深刻感悟。

的雪景讓他們宛如置身於王維的水墨畫《雪霽圖》中，並多次強調這種身臨其境的感受。此外，首爾的古建築也讓他們彷彿穿越回中國歷史。景福宮兩側迴廊的木刻和石雕，讓他們看到了中華遺制的影子；月精寺的八角九層石塔⁶⁰，則讓他們感受到六朝時代的風貌。羊令野提到，這座石塔讓他聯想起故鄉安徽的水西寺石塔⁶¹，彷彿在夢中漫步於祖國的山川之間。商禽也表示，江原道的雪景與風光喚起了他對大陸的思念。從徐廷柱主辦的半月閣晚宴到興天寺⁶²傳來的鐘聲，他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鄉愁；而在民俗村，他則體會到一種美學上的懷舊情感。

洛夫則提到，雲堂旅館的窗戶形狀和高度具有唐代風格，風鈴聲彷彿是王維的吟誦。張默則表示，民俗村裡的草屋、兩班宅、農家、荊條門、豬圈和地下大將軍⁶³等景象，彷彿將他帶回四五百年前中國燦爛的傳統，讓他覺得自己正漫步於唐代的某條小徑上。在古宮的回廊、垂柳和石板鋪成的廣場上，他聯想到李白的詩句「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⁶⁴。梅新看到石碑後感歎，「禮失而求諸野」⁶⁵這句話似乎再正確不過，並表示大多數人為了國學研究前往日本，但

⁶⁰ 這座石塔位於江原特別自治道平昌郡珍富面五台山月精寺，是高麗後期以花崗岩建造的多角多層石塔。2001年、2002年及2005年，文化遺產發掘調查團對石塔周邊區域進行了詳細的發掘調查。透過對土層的研究，在石塔地表以下發現了中國宋代的銅錢，包括崇寧重寶和聖宋元寶，從而推斷石塔的建造年代約為12世紀。此外，挖掘出土的帶有銘文的瓦片，進一步證實了月精寺曾於世宗28年（1446年）和光海君2年（1610年）進行過修繕的歷史事實。

⁶¹ 羊令野，本名黃仲琮，安徽涇縣人。水西寺是他家鄉一座歷史悠久的寺廟，與他的成長背景緊密相連。正因如此，當他在異鄉見到與水西寺相似的建築時，不禁喚起對故鄉的深切懷念與情感共鳴。

⁶² 這座寺廟是大韓佛教曹溪宗直轄教區曹溪寺的末寺，位於首爾特別市城北區。其創建初衷是為了祈求朝鮮第一代王太祖的妃子神德王后康氏的冥福，具有深厚的歷史與宗教意義。

⁶³ 這是指在韓國村莊入口或路旁豎立的木像或石像，通常將人的臉型刻劃於樹幹或石頭上，被稱為「神木」。它作為村莊的守門神、守護神，或是寺廟與地區之間的邊界標誌與里程碑，廣泛分布於全國各地。在木柱或石柱的上部，簡潔地刻劃或雕刻出人或神將的臉部形象，下部則刻有「天下大將軍」、「地下大將軍」等文字以及距離標記，成為一種兼具信仰與實用功能的象徵物。

⁶⁴ 此句出自唐代詩人李白的《登金陵鳳凰台》，全詩如下：「鳳凰台上鳳凰游，鳳去台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這首詩以鳳凰台為背景，描繪了歷史的變遷與人事的無常，表達了詩人對時光流逝與家國興衰的深沉感慨。

⁶⁵ 此句出自《論語》，意指當傳統的禮法制度崩壞或失落時，應回歸民間或樸素的生活中，尋找其本質與真諦。

他認為應該來韓國。張默則在徐廷柱準備的晚宴上，以詩的形式表達了這種深切的思鄉之情。

今夜，異國的景致如此淒美
為了共讀這盆爐火
為了雕刻那棟雪中之松
詩人光光的脊樑爬著一陣陣的紅暈
而壁上蒼勁的漢字猶在歌著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難道這新羅的南山

真的就是咱們五柳先生夢中的南山嗎？(《雪花》，頁160)⁶⁶

在異國的首爾，冬夜裡，南山的某座古典宴會廳中，一位年長的詩人正於掛有漢字匾額的房間裡舉杯暢飲。若他吟詠南山，那情境或許正如陶淵明的詩《飲酒》般意境深遠。在這裡，新羅的南山彷彿化為陶淵明筆下理想中的南山，詩人們在韓國的傳統、文化與情感中，尋覓著中國的影響與共鳴。他們在韓國發現並讚歎中國的傳統與文化，不僅因為這裡保留了實際的歷史影響痕跡，更因為在台灣，尋找中國文化的痕跡變得日益困難。台灣位於中國大陸的邊陲地區，本就脫離了主流文化的核心，加上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以及戰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使得許多人感到難以累積並形成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洛夫在詩文集中特別提及了這一點，而巧合的是，在他們的訪問期間，《韓國日報》的報導也提到在台北尋找中國文化的困難⁶⁷，這讓人深刻體會到台灣詩人的心情。相較之下，首爾雖然也在邁向現代化，但與台北不同，它展現出一種東西方和諧融合的城市風貌，而非單方面的西方模仿。詩人們觀察到，無論是城市景觀，還是女性身上韓

⁶⁶ 張默，〈搖着我們的鄉愁——旅韓詩鈔之二〉。

⁶⁷ 在訪問團停留期間，1976年11月28日的《韓國日報》刊登了由金時福特派員撰寫的報導，標題為〈中國文化不存在的中國——台北市〉。報導中指出：在廉價文化的衝擊下，「輝煌的四千年」歷史似乎被禁錮在博物館的玻璃櫃中，街道上如果抹去紅色元素，便與東南亞城市無異；熱褲潮流中的女性面容缺乏中國傳統的神韻，快速的西化與旅遊熱潮正席捲而來。這些描述深刻反映了當時對台北文化現狀的憂慮與反思。金時福，〈中國文化不存在的中國——台北市〉，《韓國日報》，1976年11月28日，第3版。

服與西裝的混搭，都體現出對西方文明的選擇性吸收與巧妙融合，這讓他們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文化張力與美感。

此外，儘管韓國與北韓以北緯三十八度線對峙分隔，但他們仍感受到韓國在地理上與中國相連的親切感，並透過文字抒發對故鄉的無限想像與深切嚮往。洛夫在從板門店回程的路上，望著如水墨畫般的山影，思緒飄向背後的平壤、結冰的鴨綠江以及覆雪的東北三省。他寫道：「我們視線內似乎隱隱呈現出中國大陸的一片如畫江山，神州故國。遠處山谷內正升起一縷淡淡的炊煙，久久未曾散去，亦如我們胸中無盡的鄉愁。」（《雪花》，頁 41）羅門則在春川的雪景中凝視春川湖的水，思索著這些水是否源自漢江，而漢江的水又是否來自大陸。他感歎，二十多年的鄉愁如河水般緩緩流入心底。商禽在前往春川的路上，望著堆積的雪，回憶起自己作為四川人每年都能見到的雪景，雖然身處異國，卻感到比在台灣生活的三十年更接近故鄉。這是因為台灣被海峽與大陸隔開，而韓國則與大陸以陸地相連。他以詩歌抒發這種情感，寫道：「以鄉愁／願為你燃燒的／春／作淙淙的流泉」（《雪花》，頁 149）透過流淌的大地河水，召喚著故鄉的中國大陸。

羊令野則寫道：「白雪釀成的酒／醉出了漢城的夜／就聽到陽春的歌聲／流向韓江⁶⁸／流向黃河／迴響在我們的心脈中」（《雪花》，頁 145-146）在這句詩中，他以雪夜的首爾為背景，描繪出心中的情感，並假設了韓國與中國以陸地相連的事實。菩提也寫道：「風雪十萬里／漢江春水多／暖流動處／且看你我共揮戈／直上黃河」（《雪花》，頁 147）張默則詩云：

哦，我歌我唱

六出是一樣的，皎潔是一樣的，冷澈是一樣的

今天我們擁抱你是在漢江的平原

如果是在青海

如果是在西藏

⁶⁸ 「韓江」一詞實際指的是「漢江」。除了羊令野之外，其他多位詩人也使用了「韓江」這一稱呼，這很可能是受到「韓國」名稱的影響，反映了詩人們在異鄉創作時對當地文化的融入與借鑑。

如果是在長江三峽
我將摘下，統統地摘下，摘下
哦，那一天可以真正啃你親你舔你
那綿延萬里火焰一般的中國的雪啊（《雪花》，頁 168-169）

他們透過首爾的雪，懷念著延伸至青海、西藏和長江三峽的中國，將對故鄉的思念化為詩句，寄託於文字之中。

由此可見，台灣的現代詩人在韓國所共同感受到的深切鄉愁與對中國傳統的重新發現，最初或許來自於韓國嚴寒的冬季氣候與中國北方相似的建築風格，這些都是台灣難以體會的。然而，更深層的原因在於，他們因國共內戰失利而離開故土，遷居台灣後便再未能返回家鄉。撤退至台灣後，國民政府曾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誓言奪回中國大陸，但實際情勢卻難以如願。到了六〇年代初，這些詩人逐漸意識到，重返故土的可能性愈發渺茫。訪問團中的現代派詩人來自中國各地，自 1950 年以來，他們從未有機會回到家鄉。因此，當他們在首爾目睹漫天飛雪、古典風格的宮殿與傳統民居時，那分積壓已久的鄉愁瞬間湧上心頭。

此外，地理上的相似性也加深了這種情感連結。漢江作為韓國的母親河，與中國的黃河、長江遙相呼應，讓詩人們產生一種心靈上的親切感，彷彿沿著江水向北行進，便能抵達故鄉。正因如此，當韓國詩人金良植在訪問團面前朗誦她的詩〈啊啊朋友啊〉時，觸動了在場所有人的情感，讓人不禁紅了眼眶。這首詩後來發表於 1976 年 11 月 30 日《韓國日報》立冬詩壇，內容如下：

朋友啊，你佇立在這片通往故鄉的土地上，
凝望著陰影覆蓋的雪，淚水悄然滑落。
屋檐下懸掛的冰柱，如珍寶般被你捧在手心，
臉頰輕觸金色的冬草，反覆低泣，無聲訴說。

「我的故鄉在湖南，在四川，在浙江，
沿著這片土地，啊，是的，

三十年來，只在夢中往返的故鄉，
淚水匯成河流，夢中的故鄉啊，
就在那裡，就在那裡。
秋日丹楓如火，冬日大雪紛飛，
環繞著祖父，祖父的祖父留下的土地，
那便是我的故鄉，
這片與天相連的故鄉，
讓我的悲嘆迴盪在天際，無盡綿長。」

啊，朋友啊，
我無法止住你臉頰上流淌的恨淚，
只能將這白手帕，輕輕遞給你，
願它拭去你心中的哀傷，
伴你尋回那遙遠的故鄉。⁶⁹

不知是否因這首詩激發了先前的台灣詩人對地理的想像，抑或是曾多次與他們會面的金良植代為表達了他們的心聲，但可以明顯看出，韓國離散家庭⁷⁰與無法回歸故鄉的台灣詩人之間，情感上產生了深刻的共鳴。這種共鳴使得台灣與韓國的詩人建立起深厚的同病相憐的友誼。對此，張默回應道：

時間，還是那麼緩緩的走著
漢城的天空與安慶的天空究竟有什麼差異呢
要不是太平洋的波濤
要不是鴨綠江的易色

⁶⁹ 金良植，〈啊啊朋友啊〉，《韓國日報》，1976年11月30日，第1版。

⁷⁰ 這主要指因韓國戰爭與南北分裂而被迫分離的家庭。儘管缺乏精確的統計數據，但據推測，這類離散家庭的人數約達一百萬人。這些家庭的分離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劇，也深刻反映了韓國歷史與政治的複雜性。

我們會在洞庭湖畔

以道地的無為話唸您的詩（《雪花》，頁 158）⁷¹

這番話表達了若非冷戰的局勢與北韓政權的阻礙，他們本可在故鄉，以故鄉的語言，吟誦金良植的詩篇。因此，參觀板門店讓他們深刻體會到北方的道路已被封閉，並使他們直面與台灣相似的現實——韓國正與共產勢力對峙。尤其是在訪問團抵達的幾個月前，1976 年 8 月 18 日發生了震驚國際的板門店斧頭事件⁷²，這讓他們在嚴密的警戒氛圍中，深切感受到南北韓之間的緊張局勢。透過參觀板門店，訪問團進一步深入了解了韓國的現實處境。基於自身的經歷與觀察，他們透過詩歌表達了深刻的思考。羊令野強調了對真理見證的重要性，洛夫則在詩中探討了民主與暴政、自由與奴役的對比。辛鬱則寄託了對未來的希望，認為北韓的共產政權終將被推翻，韓國也將迎來統一。如此一來，他們的詩歌不僅僅是情感的抒發，更蘊含了深刻的政治意涵，成為對時代現實的深刻反思與回應。

殘廢的曠野

拉住瞎了的天空

一個不能動 一個不能看

它能到那裡去

天地線是緊縮在腳上的

一條沉重的鐵鍊

鳥飛 天空逃

風吹 樹木跑

誰要是站在那裡不走

⁷¹ 張默，〈滄茫的影像——旅韓詩鈔之一〉。張默（張德中）是安徽無為人。

⁷² 板門店斧頭事件是指 1976 年 8 月 18 日發生於板門店附近共同警備區內的一起嚴重衝突。事件中，約三十名朝鮮人民軍軍人揮舞斧頭，襲擊了正在監督修剪榆樹枝的兩名駐韓美軍軍官，導致其不幸身亡，並對駐韓美軍及韓國軍的多數部隊造成損害。這一事件也被稱為板門店事件、板門店斧頭謀殺事件或 8·18 斧頭事件，是韓半島南北對峙期間最具代表性的衝突之一，進一步加劇了南北雙方的緊張局勢。

槍聲會從寂靜中

一排排過來（《雪花》，頁 83-84）⁷³

我們站在南邊，這裡是一片美麗的雪國

我們遙指北地，那裡是一片萋萋的荒原

請走，請再往前走

順著漢江大道

越過文山驛

越過安安靜靜的卅八度線

越過每一寸染著血的受傷的土地

越過億萬隻失神蒼白的眼睛（《雪花》，頁 164）⁷⁴

在〈板門店·38度線〉一詩中，破碎的荒野與盲目的天空象徵著北方自由的缺失，天地的邊界彷彿被束縛於腳下沉重的鐵鏈。沉默中逐漸逼近的槍聲，則隱喻著三八線潛伏的威脅。而在〈鐵馬，想開〉中，詩人透過對比南方和平的自然景象與北方荒蕪的土地，勾勒出一條橫越兩者的旅程，鼓勵人們勇敢跨越困難與創傷，邁向治癒與和平。此外，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不再回來的橋」與文山矗立的標語「鐵馬想飛」等意象也屢屢出現，這些詩句不僅訴說著戰爭的餘波與自由的珍貴，也傳達了對未來的期許，呼籲中韓兩國攜手崛起於亞洲，共同維護反共的信念與價值。

此外，洛夫提到在首爾見到的金素月（1902-1934）和徐廷柱（1915-2000）詩碑，以及《韓國日報》每日在頭版刊登一首詩的專欄，讓他深刻感受到韓國社會對文學的重視與對詩人的尊重⁷⁵。他表示，此次訪韓最大的收穫是重新找回了作為詩人的自信與尊嚴⁷⁶。韓國詩壇的和諧氛圍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並認為

⁷³ 羅門，〈板門店·38度線〉。

⁷⁴ 張默，〈鐵馬，想開——旅韓詩鈔之四〉。

⁷⁵ 洛夫提到，不僅是詩碑，還有《韓國日報》頭版的立冬詩壇專欄，以及他們訪問團受到的熱情迎接，都讓他印象深刻。此外，1997年11月號的《韓國文學》中刊登了由許世旭翻譯的中國現役詩人十位的作品，這一切讓他由衷讚歎韓國為「詩的國度」。

⁷⁶ 1976年11月27日，洛夫在訪問韓國期間，其詩作〈漢城之楓〉由許世旭翻譯，並刊登於《韓國日報》的立冬詩壇專欄中。洛夫著，許世旭譯，〈漢城之楓〉，《韓國日報》，1976年

應以此作為借鑑。這樣的發言或許源於他對台灣現代詩壇自五〇年代以來持續存在的爭論與批評的反思，例如關於詩的晦澀性、缺乏民族性及社會性等問題，詩社與詩人之間曾多次發生爭執。

訪問團最重要的行程之一是與韓國文壇的交流。他們與韓國筆會、韓國文人協會以及月刊《韓國文學》的相關人士進行了詩朗誦會和座談會等活動，深入探討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詩的明朗性與晦澀性之爭、詩語言與意象創造等議題。參與交流的韓國作家包括全光鏞、趙炳華、趙演鉉、宋堯仁、許世旭、徐廷柱、權逸松、金良植、楊明文、洪潤基、崔貴童、申東春、金宗文等。其中，眾人特別記錄了對徐廷柱住宅的拜訪以及他主持的半月閣晚宴的情景。徐廷柱的詩作已通過許世旭的翻譯與介紹為人所知⁷⁷，大家一致認為他是深受韓國人民愛戴的資深詩人。羊令野認為，徐廷柱深受中國文學的薰陶，並精通佛理，其詩作達到了清真隱逸、超然物外的境界。張默提到，徐廷柱鍾愛莊子、李白和陶潛的詩，並創作了許多以菊花和蓮花為題材的作品。羅門則讚譽徐廷柱的詩作，認為其將人類存在的苦難融入大自然的無限之中，帶來安定與平靜，賦予讀者淨化與昇華的感受，使人回歸本真的純粹。他認為，這種追求永恆生命的精神境界，正如王維與陶淵明的忘我之境，理應受到世人的尊敬。

同時，梅新認為徐廷柱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精神的詩人，透過他的詩作，兩個民族的歷史苦難與情感得以共鳴⁷⁸。這一觀點或許源自對〈菊花旁〉一詩的詮釋。通常，這首詩被視為描繪一位經歷人生波折後達到觀照境界的中年女性。羊令野也接受了這種解讀，認為詩中為了讓菊花盛開而經歷的試煉，彷彿是在閱讀大韓民族的現代史，並將兩國的處境比喻為杜鵑鳥悲傷的鳴叫聲。此外，詩中出現的菊花讓台灣詩人們立刻聯想到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將其

11月27日，第1版。

⁷⁷ 1964年，文星書店出版的《韓國詩選》中，收錄了包括徐廷柱在內的三十七位詩人的翻譯作品。其後，許世旭於1978年翻譯了更多詩作，並在白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可思莫思花》。崔南善等著，許世旭譯，《韓國詩選》（台北：文星書店，1964年）。許世旭編，許世旭譯，《可思莫思花》（台北：白雲，1978年）。

⁷⁸ 訪問團自然不知道徐廷柱在日據時期曾參與親日雜誌《國民文學》與《國民詩歌》，並創作了親日詩〈松井伍長頌歌〉（1944），甚至曾擔任日本的戰地記者。

視為遠眺群山的隱逸者⁷⁹。如果說陶淵明在菊花中看到了另一個世界，那麼徐廷柱則為了一朵菊花的綻放而無法安然入睡。這種對比不僅突顯了兩位詩人對菊花的獨特情感，也反映了他們對生命與世界的不同觀照方式。

此外，梅新以〈石窟庵觀世音之歌〉（1976）為例，探討了徐廷柱的詩作雖不大眾化卻仍深受韓國普通民眾喜愛的原因。他推測，這或許源於詩中蘊含的傳統情感，並將此視為徐廷柱詩作的獨特魅力。訪問記中也收錄了多首獻給徐廷柱的詩作⁸⁰，其中方心豫的詩〈神之使者——記韓國詩人徐廷柱〉如下所示。

悠悠然，盤膝凝思
跌坐成
一位入定的尊者
任星星沉睡於漢江
白雪渡過天際

方方的書案
一燈如斗
浮盪著那斑白髮額和一張時間雕成的臉
沒有迷惘，沒有怨憎
可以聞及勻稱的吸呼
在心空裡迴旋

哦，汝乃詩神使者！
仰天而嘯
化為一縷寒空冷冷的青煙

⁷⁹ 事實上，將菊花比作女性的做法與中韓兩國文學中菊花的傳統象徵意義相去甚遠。

⁸⁰ 羊令野，〈半月閣：兼贈韓國元老詩人徐廷柱先生〉，收錄於《雪花》，頁 26-27；羅門，〈一朵幽美的空寂：贈給我崇敬的韓國詩人——徐廷柱〉，收錄於《雪花》，頁 73-75；方心豫，〈神之使者——記韓國詩人徐廷柱〉，收錄於《雪花》，頁 214-215。

這樣對徐廷柱的一致讚美與高度評價，或許是因為許世旭的翻譯，使台灣訪問團事先認可了他的藝術性⁸¹；也可能是因為傳統風格的宅邸所營造出的東方氛圍，以及詩人自稱為中國人後裔，帶來了親切感⁸²。此外，晚餐時所在的韓式庭園半月閣、隱約傳來的興天寺鐘聲，以及映照在月光下的皚皚雪景，無疑喚起了他們對中國大陸的風景與情感記憶，進而激發出熱烈的讚美。

這是因為來訪的台灣現代詩人皆是從中國大陸渡海而來的失鄉者，身處無法預期回鄉的困境。儘管個別差異存在，他們的文學追求始終基於傳統的現代主義文學。因此，當時韓國文壇與學術界所討論的民族文學及批判現實性等文學的社會功能，可能未能引起他們的共鳴。當然，無論在何時何地，對外國文壇的全面接觸皆難以實現，唯有透過特定的媒介才能進行交流。若認同這一點，那麼透過許世旭的翻譯與非社會派的徐廷柱文學之間的接觸，便顯得自然而合理。台灣訪問團的詩人普遍關注詩語言的琢磨與內在世界的探索，而冷戰期間，兩國皆面臨與共產陣營對峙的局勢，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個人自由的信仰與內心世界的關注成為雙方交流的共同條件與前提。因此，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核心價值——重視藝術性而非社會性，與徐廷柱的文化權威地位相互契合，這種交流與親密關係，正是東亞文化冷戰格局下的一種現象，並持續至七〇年代末。

此外，由於台灣訪問團的詩人皆有中國大陸背景，韓國的自然與文化所激發的鄉愁，使他們對徐廷柱及其詩作的情感投射更加深刻。徐廷柱的詩歌融合了漢學、巫俗、佛教、神話與民間傳說，展現出濃厚的古典精神與土俗抒情風格。在他身上，台灣詩人們看見了東方文化的普遍性，並在其中找回了他們長久以來渴望的文化傳統與故鄉情懷。由此可見，台灣詩壇對徐廷柱的推崇，不僅僅是基於個人詩歌風格，而是與中國現代史所塑造的特殊歷史條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反共意識密不可分。

自五〇年代起，台灣詩壇的主導詩人一直受到批評，認為他們在中國詩歌的現代化過程中過度引入西方現代主義，使詩歌變得艱澀難解，並忽視了文學的社

⁸¹ 此外，台灣詩人們對徐廷柱的詩作能納入韓國課本深感好奇與關注，因為當時台灣的文學教育仍以古典作品為主，這一現象令他們感到驚訝。

⁸² 在晚宴上，徐廷柱提到自己是秦始皇派遣尋找不死藥的徐福的後代，並因此自稱為中國人的後裔。收錄於《雪花》，頁206。

會責任⁸³。面對這些批評，他們試圖透過現代化的傳承來調和藝術性與社會性的平衡。在這樣的背景下，與韓國詩壇的重要代表徐廷柱會面，無疑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在文學理念上的困惑。例如，梅新便指出，徐廷柱的詩歌展現民族固有的情感與意象，深刻描繪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因此深受全國人民喜愛。他並引用徐廷柱的話：

世界各國的詩人，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於國家多難之秋，或個人陷於逆境的時候，也正是詩的源泉最蓬勃的時機。做為一個詩人，生於亂世，何其幸運！⁸⁴

他將此理解為，中韓兩國的詩人應當直面現實，以最優美的聲調吟誦這個時代的憂患。台灣詩人正是在徐廷柱的觀點中，看見了某種程度的社會關懷。總體而言，台灣詩壇對徐廷柱的讚譽與敬重，不僅因為他是深受韓國人民愛戴的詩壇元老，更源於台灣現代詩的發展歷程、詩人群體的歷史背景與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的交織與共鳴。

四、反共的兩個面孔

台灣與韓國在近現代歷史上有著極為相似的經驗。兩國在西方資本主義透過殖民擴張與通商要求推進的帝國主義進程中步入現代，並在此過程中先後成為日本這一後發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戰後，兩國同樣被納入冷戰格局，受美國主導的自由陣營影響，在政治上承受強烈的反共意識型態壓力，在經濟上則推動發展主義政策。經過長期努力，台灣與韓國相繼終結軍事獨裁與威權政權，並在八〇年代末邁向政治民主化。進入九〇年代，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化與文化相對主義興起，兩國歷經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世界體系，並逐步進入多極化時代。然而，直至今日，台灣與韓國依然面臨與中國及北韓的地緣政治對峙，處境依舊相似。

⁸³ 1972年至1974年間，台灣詩壇爆發了一場現代詩論戰。當時，關傑明、唐文標（1936-1985）等人強烈批評台灣詩壇因過度模仿西方而出現逃避現實的傾向。對此，顏元叔（1933-2012）、余光中（1928-2017）、楊牧（1940-2020）、張錯（1943-）等現代詩壇內部人士紛紛反擊，使得這場辯論進一步擴大，成為當時文學界的重要議題。

⁸⁴ 同註82，頁179。

在中國崛起、北韓核武威脅加劇之際，加之近期俄烏戰爭與美中對立所帶來的新冷戰氛圍，兩國仍面臨著嚴峻的安全挑戰。由於台灣與韓國共享相似的歷史脈絡與國際政治局勢，兩國對自身歷史經驗及應對方式的比較研究已在各領域展開。在文學方面，從殖民時期至戰後冷戰時期，關於文壇環境、主流趨勢與重要文學作品的比較研究亦相繼出現。筆者曾以「殖民」與「冷戰」為核心概念，對兩國文學進行議題導向的探討⁸⁵。然而，關於冷戰期間的文壇交流，本文則是首次嘗試進行初步的資料整理。

一般而言，冷戰時期的反共文學常被視為過去的產物，然而重新檢視其影響的必要性在於，冷戰體制作為戰後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背景，長達三十年以上深刻影響了台灣與韓國的社會發展。而「冷戰文化」的意識型態與情感結構，不僅滲透於當時的文學作品，也在兩國文壇的交流中有所體現。因此，本文簡要回顧冷戰時期台韓文壇的交流歷史，並聚焦五〇年代與七〇年代兩次作家友好團訪問的記錄，探討當時文人彼此的認識與互動。本文的研究主要依據台灣方面的資料，雖然在整體掌握上尚有不足，但仍可藉此對台韓文壇的冷戰交流歷程進行初步梳理。

首先，自五〇年代後期起，台韓文壇的相互訪問日漸頻繁，並持續至七〇年代。這些訪問主要透過兩國的文人協會、作家協會或反共亞洲聯盟等機構的邀請而進行。在這一過程中，韓國作家宋志英與趙炳華多次訪台，與台灣作家彭歌、陳紀瑩等人展開互訪，進一步深化兩國文壇的交流與合作。除了雙方的相互訪問外，自1959年起，國際筆會主辦的作家會議也成為促成兩國文學交流的重要平台⁸⁶。若僅觀察在兩國舉辦的會議，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在台北舉行，韓國代表團由朴鍾和率領，共有十三名代表參與。同年六月，國際筆會的年度活動——世界作家會議在首爾召開，這是該會議首次在亞洲舉行。特別貴賓林語堂，以及由

⁸⁵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新北：聯經，2013年）；崔末順，《殖民與冷戰下的台灣文學》（首爾：書享出版社，2019年）；崔末順，《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對臺韓文學的一個觀察》（台北：遠景，2021年）等書。

⁸⁶ 中國筆會於1925年在大陸時期申請加入國際筆會，但因國家動亂而中斷參與，直至1959年才在於法蘭克福舉辦的第三十屆國際筆會大會上重新開始參加會議。韓國筆會則於1954年成立，並從1955年於倫敦舉辦的第二十九屆國際筆會大會起正式參與國際筆會的活動。

陳紀瑩和王藍擔任正副團長的十三名台灣代表也出席了會議。會議決議設立「亞洲筆會翻譯局」，並創辦《亞洲文學》雜誌，專門刊登翻譯作品。1976年、1978年和1979年，台北相繼舉辦了亞洲作家會議、亞洲文學會議以及中韓文學會議，探討文學的時代課題，並介紹各自的文學成就。從台灣的資料來看，冷戰期間兩國文壇的交流雖然在不同時期關注的文學議題有所變化，但其核心目標始終是促進作家間的友誼與相互理解，以共同應對共產勢力的威脅。隨著文學作品的交流與認識的深化，相關的文學研究範圍也逐步擴展。

接下來，回顧五〇年代與七〇年代兩次作家訪問團的交流紀錄。首先，1957年，由十二名韓國作家與媒體人組成的文化親善團訪問台灣，並撰寫了《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記錄他們對台灣的印象。正如前述，此次訪問是依據反共亞洲聯盟中國總會的計畫，成員們考察了台灣各地，普遍見證了台灣的發展，並型塑出「富裕的友邦」形象。他們觀察到台灣穩定的農村經濟、能源的自給自足以及國有企業的盈餘，並將台灣的社會發展與韓國相比，視為值得仰慕與學習的榜樣。此外，訪問團成員特別強調台灣人民的樸實風貌以及日常生活中展現的平等社會氛圍，認為國家的發展與國民素養的提升，是在與共產勢力對峙的情勢下，亟需實現的國家願景。他們認為，自給自足的強盛國家，是堅定反共的基礎與前提，只有擁有與台灣相當的國家實力，韓國才能與台灣深化作為反共盟友的關係，共同對抗共同的敵人。尤其在金門的考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信念，訪問團成員皆留下了共同承擔反共歷史責任的記錄，表達堅守自由陣營的決心。

其次，1978年在台灣出版的《雪花的約會》記錄了由十位台灣現代詩人組成的訪問團，於1976年11月在首爾、春川等地及板門店進行為期一週考察的詩文集。該書還附錄了譯自韓國的詩作，被視為兩國文壇交流的重要成果。雖然詩人們的關注點各有不同，但對韓國的整體印象卻高度一致——他們認為這是一個仍保有深厚歷史、文化與傳統的國度，因此喚起了對故鄉的思念。這些詩人皆是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文人，二十多年來無法返回故鄉，也未曾得到任何回鄉的承諾。正因如此，韓國的氣候、風景與建築風格，使他們強烈聯想到自己的家園。而與台灣不同的是，韓國與中國大陸相連，這使得「歸鄉」的想像變得更為具象。然而，北韓共產政權的存在，阻礙了這種可能性，使他們不自覺地對北韓及其背

後的中共和蘇聯產生批判意識。而在板門店親身感受到韓朝對峙的緊張氛圍，更進一步強化了他們與韓國之間的反共聯盟意識及共同應對的決心。換言之，他們對故鄉的思念與對民族傳統的渴望，唯有在反共的前提下，才能被合理化並付諸實現。在對韓國文學的理解上，這種心理狀態尤為明顯，特別是在訪問詩人徐廷柱後留下的記錄中。他們將其詩作視為透過東方傳統表達人類苦悶的藝術形式，並對其給予高度讚譽。這種評價的背後，實際上反映了反共體制所保障的個人內在探索空間，以及對民族傳統的肯定，這正是文化冷戰時期東亞地區的典型現象。換句話說，中國現代史所塑造的特殊歷史條件，以及由此衍生的根深柢固的反共意識，正是台灣詩人們對徐廷柱推崇備至的核心原因。

從上述兩次作家訪問團的記錄比較可見，五〇年代韓國文人對台灣的印象，主要聚焦於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帶有明顯的未來導向；而七〇年代台灣詩人團對韓國的印象，則更多體現對自身文化認同的確認，呈現出過去導向的視角。這一對比反映了冷戰初期與後期的時代變遷，以及兩國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差異，特別是中國現代史的曲折所造成的影響。這種變化，實際上展現了反共意識在不同時期的兩種面貌：一方面，強調建立比共產勢力更為優越的先進國家，以追求發展與進步；另一方面，則是對共產勢力所破壞的民族文化與傳統的懷念。這兩種立場，雖然方向不同，卻同樣植根於冷戰時期的反共意識型態之中。

二戰結束後，隨著來自中國的撤退文人成為主導力量，台灣文壇與殖民時期的脈絡產生斷裂，迅速納入戰後的冷戰體系。韓國文壇亦在解放後深受美蘇對峙的冷戰氛圍影響，加上南北分裂與內戰，使其長期難以深入反思與檢討殖民經驗與記憶，而是優先應對共產化的現實威脅，尋求國家安全與穩定。在此歷史條件下，即便台韓兩國共有相似的被殖民歷史，冷戰時期雙方文壇的交流仍主要集中於反共議題，顯示出兩國在意識型態與文化政策上的共同取向。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羊令野等著，《雪花的約會》（台北：天華出版社，1978年）。
- 宋志英等著，《台灣紀行：自由中國的今日》（首爾：春潮社，1958年）。
- 金東仁等著，葉石濤譯，《地下村——韓國短篇小說選》（台北：名流出版社，1987年）。
- 金東里著，金南喜譯，《等身佛：韓國短篇小說選譯》（台北：黎明出版社，1983年）。
- 陳千武編，《韓國現代詩選》（台北：光啟出版社，1965年）。
- 崔末順，《海島與半島：日據台韓文學比較》（新北：聯經，2013年）。
- 崔末順，《殖民與冷戰下的台灣文學》（首爾：書享出版社，2019年）。
- 崔末順，《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對臺韓文學的一個觀察》（台北：遠景，2021年）。
- 許世旭編，許世旭譯，《可思莫思花》（台北：白雲，1978年）。
- 張世珍，《悲傷的亞洲：韓國知識分子的亞洲旅行（1945-1966）》（首爾：藍色歷史，2012年）。
- 崔南善等著，許世旭譯，《韓國詩選》（台北：文星書店，1964年）。
- 陳紀澄，《國際筆會與亞洲作家會議》（台北：重光文藝，1978年）。
- 趙炳華，《石阿花：趙炳華詩集》（首爾：正音社，1958年）。

二、期刊論文

- 尹英賢，〈冷戰時期韓國社會對「自由中國（台灣）」的認識〉，《韓國學研究》第68期（2019年3月），頁119-164。
- 朴延熙，〈第29屆東京國際筆會大會（1957）及其冷戰文化史意義與視野——以1950年代後期美國文化援助與東西文化交流話語為中心〉，《韓國學研究》第49期（2018年5月），頁189-222。

南光奎，〈冷戰時期東北亞韓國與台灣關係的變遷過程與特徵分析〉，《韓國報動論叢》13卷3號（2014年9月），頁39-60。

孫準植，〈從「兄弟之邦」到「凶地之邦」——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1948-1992）〉，《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8號（2013年6月），頁27-53。

張世琳，〈對趙炳華詩集《石阿花》（1958）中「台灣」認識的研究〉，《東岳語文學》第80期（2020年2月），頁49-83。

崔末順，〈葉石濤（1925-2008）與陳映真（1937-2016）：「臺灣文學」的兩條道路〉，《韓民族文化研究》第76期（2021年12月），頁7-52。

鄭文祥，〈冷戰時期韓國人對台灣的認識——以報紙對台灣關係的報導為中心〉，《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第58號（2013年6月），頁87-103。

三、雜誌文章

不著撰者，〈出席友邦作家芳名錄〉，《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頁6-8。

不著撰者，〈我們對文學的意見〉，《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頁9-17。

穆中南，〈對亞洲作家會議的期望〉，《文壇》第120期（1970年6月），頁4-5。

四、報紙文章

不著撰者，〈三女作家 赴韓訪問〉，《聯合報》，1965年5月10日，第2版。

不著撰者，〈韓國文化團 訪程延五天〉，《聯合報》，1957年12月12日，第3版。

不著撰者，〈社論：讚美自由中國〉，《朝鮮日報》，1957年12月26日，第1版。

季季，〈他山之石——側寫韓國文藝振興院院長宋志英先生〉，《聯合報》，1979年6月18日，第12版。

金良植，〈啊啊朋友啊〉，《韓國日報》，1976年11月30日，第1版。

金時福，〈中國文化不存在的中國——台北市〉，《韓國日報》，1976年11月28日，第3版。

洛夫著，許世旭譯，〈漢城之楓〉，《韓國日報》，1976年11月27日，第1版。

陳寧寧，〈綻開的菊花——歡迎韓國大詩人徐廷柱先生訪華〉，《聯合報》，1978年

8月25日，第12版。

彭歌，〈韓國的作法〉，《聯合報》，1970年6月27日，第9版。

彭歌，〈長他人之勢〉，《聯合報》，1970年8月22日，第9版。

彭歌，〈所知與所感〉，《聯合報》，1970年8月17日，第10版。

彭歌，〈韓國爭取諾貝爾〉，《聯合報》，1975年6月13日，第12版。

葉維廉，〈慶州行〉，《聯合報》，1978年8月1日，第12版。